

谈谈民主和集中 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性

丹 青 編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談談民主和集中
自由和紀律的統一性

馬 青 編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肥市金寨路)

新聞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2号

總發行所 安徽省新华書店發行

787.1×1092 1/32 • 印張1 1/3 • 字數：29,000

第一版 1960年1月第一版

1960年1月合肥第三次印刷

(印數：20,001—40,000)

統一書號：T3162·994

定 價：(5) 0.11 元

編 者 的 話

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我國人民絕大多數對於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係問題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不論是職工、社員，還是學生，組織性、紀律性大大加強了。隨着生產的躍進，人們的精神政治面貌煥然一新，愛護集體、愛護國家、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的向秀麗式的英雄人物，正在各個戰線上湧現出來。這對於發展生產，搞好工作和學習，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事實表明，在我們人民內部，有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在他們看來，民主、自由就是隨隨便便，不講紀律，個人行動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也有人認為，講集中，就可以不要民主了，在領導工作中，可以簡單化，不走羣眾路線了。這些顯然是錯誤的。為了幫助讀者提高認識，加強組織紀律性，進一步改進工作，發揚民主作風，以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躍進，我們在這裡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等關係問題一一進行了討論。並着重聯繫實際，結合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對人們思想中殘存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觀點作了批駁。現在全國上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思，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了，本書的出版如能對讀者在政治思想的提高方面有所幫助，那是我們衷心的願望。文中不妥之處，還請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1959年3月

再 版 說 明

1958年，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們根据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中心教材——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的有关問題，以及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情况，~~由~~^請有关作者，先后編写了一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丛书”，曾在配合党对干部、青年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虽然時間已經过了一年多，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基本論点方面来看，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因此，为了适应理論学习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帮助干部和青年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論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特請原作者予以修訂再版。

1960年3月

目 录

一、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	(1)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	(1)
民主、自由的阶级性.....	(2)
民主和专政的关系.....	(8)
二、民主和集中.....	(11)
什么是民主集中制.....	(11)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13)
集体领导是党的重要领导原则.....	(19)
公社“四化”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	(22)
三、自由和纪律.....	(24)
什么是纪律.....	(24)
在阶级社会中，纪律是剥削阶级	
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	(24)
社会主义社会的纪律，是维护	
劳动人民利益的工具.....	(25)
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26)
纪律性和创造性的关系.....	(31)
四、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纪律，发扬民主作风.....	(35)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纪律.....	(36)
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培养共产主义风格.....	(38)
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作风.....	(39)

一、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

一般說来，所謂民主，就是人民羣众的事要由人民羣众当家作主的意思，我們通常所說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指多数人的政治，指由人民羣众掌握政权，管理国家大事。人民羣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羣众的事，由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天經地义的。

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認識。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的变化发展，都不是乱七八糟的，而是按一定的规律（客观的必然性）发展变化的。作为哲学范畴来講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絕对的自由，它只能是認識和运用了客观规律的实践。所以恩格斯說：“自由不是在于想象中的对自然规律的独立，而是在于認識这些规律，并且在这种認識所給与的可能性之上，有计划地使得自然规律为着一定目的发生作用。”（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頁）拿我們的治水工作來說，也是这样，在我們沒有掌握水的規律，創造条件修堤筑塘来利用它以前，就只好听天由命，久雨則涝，久晴則旱，人們在水的面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談不上对水的利用；但是，當我們大兴水利工程以后，水害就变成了水利，生产发展了，人民在水的利用上，就会获得更大的自由。作为政治权利的自由，也是一样，从来就没

有什么超階級的絕對的自由。選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人身、信仰……等自由，都是受一定的國家和社會制度限制的。

民主、自由的階級性

民主和作為政治權利來理解的自由，都是社會的上層建築，歸根到底，它是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在資產階級初期的反封建鬥爭中，他們高舉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也只是作為吸引勞動人民參加鬥爭，以便推翻封建制度，為自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開辟道路的一種手段。一朝政權到手，他們就趕快想辦法來限制勞動人民，排斥他們參與國事，把以前的種種美妙的諾言拋之腦後。世界上第一部資產階級的憲法——1787年的美國憲法，就根本否定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法案”只是在以後人民的堅決鬥爭中才加進去的。古希臘的城市民主就是奴隸主的民主，廣大的奴隸不僅不能參與國家大事，而且自己也被當成了會說話的工具，任人買賣殘殺。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它的本質仍然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吹噓的什麼“全民的”民主，其實質也只是資產階級獨享的民主，剝削階級的民主。在表面上，勞動人民的人格得到承認，被允許享受一些民主權利，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吃人的經濟制度的統治，廣大勞動人民被窮困壓榨得頭都不能抬，更談不到享受什麼民主自由了。這種民主自由也只是讓勞動者作為剝削對象而存在，用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手段。列寧說：“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個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和騙局”。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中教导了我們：“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无產階級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这正說明了民主自由的階級性，在階級社会里，从来就沒有“超階級的”、“全民的”民主与自由。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曾經对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兩党制”、“自由选举”、“四大自由”等吹捧上天，現在我們就来揭開它的黑幕看一看，究竟这是些什么样的民主自由，是誰的民主自由。首先我們就来剖視一下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吧！以美国为例，美国第八十二届国会（1953——1954年）的議員成分是：为壟断組織服务的律師二百七十九人，資本家一百三十八人，职业政客三十七人，反动新聞記者十八人，地主十八人，軍人八人，壟断組織圈定的其他职业者三十三人，国会中根本沒有一个工农羣众的代表。这样的国会，怎能算得是反映民意的机关呢？事实上縱使劳动人民在議會中占有一定席位，能够提出一些进步法案，但是只要一旦資產階級感到它的活动危及自身根本利益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撓破坏，法国今天的議會就是这样。这就充分地說明了，資本主义国家的議會只允許少数資本家有民主，广大劳动人民根本摊不到民主的分儿。

我国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还很欣賞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兩党制，說一党在朝，一党在野，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很有“生命力”。事实上，所謂兩党制，不过象壟断資產階級的两只手一样，民主只能是在資產階級政党中换来換去；資產階級从来不会对共产党說：“我不行，你来。”資產階級的两个政党都是坏蛋，人民只有

从两个坏蛋中选择一个坏蛋的自由。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告诉我们：“……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这就彻底地揭穿了它的阶级本质。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也常玩弄民主的把戏，1945年春末，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大嚷大叫，说要准备实行宪政，开会制定宪法，并美其名为“还政于民”。其实，这个“政”还来还去，仍不出国民党反动派之手。这实质上就是反动派的把民主从左手还到右手的把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也斥之为“换汤不换药”的诡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一向都吹嘘说：“我们这里人人都有自由。”这完全是骗人的假话。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是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而无产阶级呢？既无工厂，也无土地，只有自己的劳动力；要说有自由的话，那就是工人穷得什么也没有的“自由”，和为了不致饿死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忍受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再不然就是失业的“自由”，全家人流浪街头乞讨要饭的“自由”，冻饿而死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就是被这种“自由”白白地夺走了生命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法国有个裁缝工人，名叫贝尔纳，还不满二十九岁，但却卧轨自杀了。难道是他疯了吗？不是的。五个月前，他还在裁缝店里为资本家劳动着；但是有一天，资本家却无缘无故地把他裁掉了。失业后，他每天从早到晚，不是看职业介绍广告，就是登门找职业，可是每次都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回。直到他死去的前一天，他还硬着头皮走到一家工厂去找职业，可是厂里的资本家看到他身体太弱，就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在饱尝了这种失业“自由”以后，感到毫无希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怎么办呢？于是就躺在铁軌上，火車一經過，他就“自由”地死去了。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所得到的“自由”。

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掩饰，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所能给予劳动人民的自由，只能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就是这种有限度的自由，劳动人民还必须通过很多的斗争才能得到。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什么选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集会自由等等，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

资产阶级国家对于选举，规定了許多苛刻的条件，加以限制。如财产条件、教育程度、居住年限、性别、种族等等，这些限制，不下五、六十种。美国有十三个州就曾规定**貧穷者不得参加投票**。美国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必须有四十英亩土地或繳納三百美元捐稅的人，才有投票权。这种限制，在实际上就剝夺了貧穷的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规定，**妇女根本没有选举权**。在美国，由于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全国一千五百万黑人中，只有二百万人有选举权。资本主义国家是提倡竞选的，但是参加竞选的限制也非常多。許多资本主义国家规定，一个政党要提出一名竞选人，就要向国家选举机关交付很大一笔保証金。例如，在英国竞选下議院議員的人，首先要交付一百五十英磅保証金；在日本要交付十萬日元；在加拿大要交付三百元加币。不預先交付保証金，就不能被列入竞选人名单。这些规定，显然是专门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其他进步党团的。有了这些规定和限制，还談得上什么“自由竞选”呢？还談得上什么“选举自由”呢？何况现在在許多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統治者，对工人阶级政党和其他进步党团的領袖、党员，公开和秘密地进行各种污蔑、逮捕、杀害，有的干脆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这当然就更談不上什么“自由竞

选”、“选举自由”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也是一句骗人的空洞的口号。誰都知道，要出版书籍、报刊，就要有印刷厂、印刷机和纸张等；要集会、演讲、就要有集会的场所、广播设备和房屋等。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东西都被资本家所占有，无产阶级没有这些东西；工人们要使用它非常困难，除了利用时间条件有着种种限制外，往往还得付出高昂的租金。这怎能谈得上出版、集会自由呢？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况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批警察、特务、密探，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你要集会、游行，你要发表进步言论，被他们看到或听到了，轻者被逮捕殴打，重者会立即遭到杀害；进步报刊，随时都可能遭到查封捣毁；正在游行着的行列、召开着的会议，他们可以随便地捣乱、驱散或开枪镇压。这正象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所说：“你有开会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

从上面所讲的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自由。而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对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奴役。因此，它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根本反对的。

资产阶级除了宣扬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外，还向来用“社会主义不自由”等谬论来攻击我们。其实，这完全是他们在颠倒黑白，胡乱捏造的弥天大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废除了剥削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受到最广泛的民主自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现象，已经逐渐被消除了；人民不再为地主、资本家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主义而劳动；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自由地选举出人民的优秀儿女来管理国家大

事；他們結合在黨和工會、共青團等組織之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意見和智慧，參加國家管理。他們享有良好的物質設備來集會討論、傳播人類進步的思想——馬列主義，使廣大勞動人民從被奴役壓迫的精神狀態中解放出來，為人類進步事業貢獻出更大的力量；每年“五一”、“十一”和其他重大節日，我們全國人民無不興高采烈地集會遊行，顯示出了我們保衛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無比宏偉的力量。整風運動中羣眾創造的大字報，正是我們全國人民廣泛用來自由表達意見的良好形式。

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生產的提高，無產階級專政的加強，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我們全國人民享受的民主、自由權利還會不斷擴大。如在實現人民公社化和公社實現“四化”以後，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們的自由權利也更進一步擴大了。拿我們安徽來說，解放前的安徽，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多災多難，工業基礎極為薄弱，只有幾家破爛不堪的工廠。在農業方面，水利失修，生產凋敝，農民生活極為貧困。解放十年來，特別是近兩年來，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我省人民勝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使國民經濟各个方面都獲得了飛躍發展，迅速地改變着安徽的落后面貌。現在，我省已經建立起許多現代化的工礦企業，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十年來，鋼和鋼材從無到有，年產量已達到數十萬噸；1959年鐵的產量，比1949年增長兩千倍左右；煤炭產量增長十三倍左右；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了二百三十倍；全省工業總產值增長十一倍以上。在農業方面，全省灌溉面積比解放初期擴大了三倍，在淮北初步實現了河澗化、水稻化，基本上消滅了普通水旱災害，提高了对特大災害的抵抗能力。十年來雖有七年大災，但農業生產仍然得到了迅速發展；去年

遭受了百年未有的旱災，仍比1958年獲得了更大的丰收，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長三倍，棉花增長八倍以上，油料增長一倍以上。隨着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去年，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戶都增加了收入。我國人民在社會政治生活和向自然界開展鬥爭中，獲得這樣大的自由，是很多人在過去想都沒有想到的。人民公社在某些生活方面實行了集體化以後，使我國成千上萬的婦女掙脫了繁瑣的家務勞動的束縛，真正獲得了參加生產、管理生產的自由。廣大婦女參加生產，公社又實行了工資制（工資發給本人）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這就使廣大婦女進一步擺脫了家長制的束縛，在家庭中獲得同等的地位。公社辦起了敬老院、幼兒園和托兒所，使我國農村人民獲得了“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老人再也沒有后顧之憂了。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民主生活的新發展。

當然，在我們的國家里是不會有“全民的”民主和“絕對的”自由的，我們是最坦率地指出了它的階級本質的。正如劉少奇同志所說：“如果有人希望我們在憲法中去保障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活動的自由，那就只能使他失望。對於意圖奴役我們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走狗們，我們的憲法和一切法律是永遠也不會讓他們得到一點方便的。難道不正是因為我們剝奪了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人民才有了真正的自由么？”因此，我們青年知識分子，必須把民主自由這個概念弄清楚，特別要把民主自由的階級性弄清楚，要把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分開來。不然就會上當。

民主和專政的關係

明確了民主自由的概念，我們就要接着來談談民主和專政的關係。因為民主和專政，都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

物！它們随着国家权力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国家权力的消亡而消亡。在阶级社会里，对敌人的专政，与对统治阶级内部所实行的民主从来都是结合的。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对于阶级的专政，问题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的专政。在奴隶社会中，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在封建社会中，是封建主对农奴的专政；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少数资本家对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的专政。在历史上就没有“全民的”民主，民主只能用之于内部，用来调节自己内部的矛盾，团结自己的力量，以便对敌对阶级施以暴力专政；专政是用来解决敌我矛盾的，就是一定阶级用来压服敌对阶级，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的。因此，民主和专政，都被当作一种手段来运用，而不是目的。

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对剥削阶级的专政，比起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来，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无产阶级是代表最进步力量的，它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实行专政；第二，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是少数，民主的对象则是多数；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为消灭阶级压迫创造条件，而剥削阶级的专政却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在新的社会里原来少数的专政对象，当着他们本阶级被消灭，并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以后，也要逐渐地转入人民的行列，而成为民主的对象（有的如果有反动行为，也要重新转化为专政的对象）。当着这种转化最后完成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专政的对象没有了，国家对内专政的职能就消失了。如果那时仍有帝国主义存在，那么，国家对外防御侵略的职能仍然要保存下来。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压迫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及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破坏者、为了防御国内

外敌人的顛复活动和侵略，必須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公开宣告：对于反动分子只能压服，不能說服，“团结——批評——团结”的公式对他們是不适用的。但是，右派分子却責难我們說：“你們講专政、講暴力”，“不民主”，“是极权政治”，“违背人道和人性”。右派分子的責难，是吓不倒人的。无产阶级就是要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专政，不給予民主。事实証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必要的。革命胜利了十多年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由于沒有認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致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受了巨大損失。我国有少数青年知識分子，也曾經对民主和专政有过錯誤的看法，認為要民主就不能有专政，要专政就不能有民主，甚至向往着西方的“民主”。这就是因为沒有弄清楚民主和专政的关系，看不出西方“民主”的虛伪性，不知道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是对人民的，专政是对敌人的，沒有专政，就不能使民主得到保障，因而，无形中作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这是应当引起警惕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大有力，之所以能够打败国外的侵略者和消灭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而肩負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任务，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实现了劳动羣众对剝削者的专政。而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就保障了广大人民获得任何剝削阶级所不能实现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这是肯定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客观实际情况是錯綜复杂的。例如，敌人的破坏活动，有时就和人民羣众一般性的“鬧事”混在一起。在一般性的羣众“鬧事”中，有时有敌对性的破坏因素存在；而敌人在进行破坏活动时，也常常用欺騙的办法，煽动一部分落后的羣众参加；尤其对青年知識分子來說，由于一部分人政治經驗少，辨不清大是大非，或者由于个人主

又沒有克服，就更容易上敵人的當。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細心地、審慎地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和鑑別；不然就難把問題的性質弄清楚，就會處理不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一般性的“鬧事”，如果不及時妥善地處理，而任其發展下去，到了一定的時候，被敵人利用，那就會使矛盾的性質發生變化，就會由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的敵我矛盾。如上面所舉的匈牙利事件的例子，就是這樣。我國右派分子也曾經到處點火，想煽動一部分人“鬧事”，目的就是要把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搞亂，使資本主義復辟。我們有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曾上過這個當。因此，正確地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採取不同的處理辦法，正當地享受民主權利，對我們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二、民主和集中

什麼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結合。正如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在人民內部，……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又是統一領導與羣眾路線相結合的制度，是領導機關同廣大人民羣眾的智慧相結合的制度，是我們黨的羣眾路線的具體反映。我們的事業是人民羣眾的事業，任何工作都

不能离开人民群众。有人說，我們的党，一不怕帝国主义，二不怕国内反动势力，三不怕向自然界作战的艰苦，就怕脱离群众。这话一点不错。很早以前党就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有名公式，把群众路线作为我們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論我們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或是一般的领导方法，都贯彻执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这一重要原则。我們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一贯正确，就是由于党忠实地贯彻了群众路线，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早在十五年以前，他在给党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01頁